

导 论

一、社会交往问题在当代中国的凸显

社会交往问题是一个关涉到社会进步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结合时代的发展，厘清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交往理论的基本思想，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

首先，开展社会交往研究是时代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要求。从国内看，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变，社会交往的规模迅速扩大，节奏显著加快，层次不断加深，意识不断增强，变化是重大和深刻的。从国际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席卷全球，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广泛。与此同时，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由于当代经济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势力的扩张，国际交往中的矛盾也层出不穷。因此，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阐明当代社会交往发展的趋势和特点、意义和作用，反思当代人的生存境况和生活方式，成为一项异常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其次，开展社会交往研究也是基于社会发展的实践关切，即

对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合理的交往模式的期待、设计与建构。从历史上看，作为社会哲学重要内容的社会交往理论在西方的兴起是与近代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交往理论虽然在古代就有许多思想家给予过关注和思考，但只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世界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时，才使得社会交往问题的研究成为一种迫切的理论需要，并具备了建立一种社会理论体系的客观基础。马克思关于社会交往理论的论述、雅斯贝尔斯以及哈贝马斯等的社会交往理论，都是在市场经济以及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的。

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是由前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机制的全面转轨，它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因而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社会及全球化进程中交往研究的理论成果也就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但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极为不同的时间、空间中进行的，因而又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交往理论。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它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起点和面临的世界格局都与先发展国家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不相同，它所遇到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因此，中国必须建立适合自己时代、自己国情的社会交往理论和社会交往模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先发展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原生的，其现代化也是原发型的，这种社会转型是一种相对缓慢的社会变化过程。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则是追赶型的，在其体制转轨时期是一种急速的变化过程。在这种急速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往往可能迅速地集中和放大，因而蕴涵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极大地增强社会变革的自觉性。显然，社会变革的自觉性的增强不能不依赖于社会哲学的研究。而人们要主动、积极、自觉、合理地开展交往实践活动，充分发挥社会交往的功能，也就不能不有赖于对转型时期交往方式变迁和交往实践特

点的研究。

事实正是如此。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必然伴随实践结构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和社会交往模式的深刻转型。然而，转型的过程是很艰难的。这里必然有一个交往方式或模式合理与不合理、科学与不科学的问题。科学合理的交往模式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不科学不合理的交往模式却只能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因而建立科学合理的交往模式在当前尤为重要和关键。

由此引发以下一系列问题：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前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使社会交往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信息时代的社会交往又具有哪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其社会文化后果如何？当前我国社会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困惑、矛盾有哪些？解决的对策、途径和措施又是什么？合理社会交往模式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建构？等等。这些问题是每一位当代理论工作者都必须重视并需要做出自己的回答的。

再次，开展社会交往研究也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要想保持自己的生命之树常青，就必须深深扎根于社会现实之中，时刻对社会现实中的问题给予关注并做出自己的回答。我们知道，一段时间以来，哲学发展陷入人们所谓的“困境”和“贫困”之中，造成这种状况固然有哲学以外的多种原因，但哲学自身脱离社会现实，不能为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提供应有的指导和借鉴，哲学失去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则是一个内在的根本性的原因。哲学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对于人类生活的终极关怀，但它应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而不是一种无根的抽象王国。本课题研究便是探索沟通哲学与现实生活的有效途径的一种努力，也是为了克服目前哲学

发展中的根本缺陷、促进哲学繁荣发展的一种努力。可以相信，包括社会交往问题在内的社会哲学研究将使我国哲学研究的面貌发生重大的变化。

最后，这一理论追求也是我国走入世界哲学进程的一种理论努力，是对西方哲学的回应、对话、反思与批判。以哈贝马斯和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大量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重视，把社会交往问题一起推为高峰，而成为理论界一大热潮。但西方学者构筑的社会交往理论，是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危机而做出的理论抉择。虽然西方社会交往理论具有丰富的内容，但建立我国新型、合理的社会交往模式，必须辩证看待西方社会交往理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二、我国理论界关于社会交往问题的研究状况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社会交往问题一直是国内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社会交往问题的理论研究多于实践研究 对交往手段和交往方式革命问题 尤其是对当代信息化交往手段革命与交往方式变革及其重大社会意义的研究尚属空白。

时下 我们的研究视角主要在文本层面上，一方面指向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哲学的思想文本。前者的努力在于厘清和挖掘唯物史观在交往层面的理论意蕴，寻求交往这一人的实践维度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的应有之义和应有地位，确立了交往实践观这一基本的理解范式。后者则使我们体认到当代西方哲学的新的变化趋势。在回应与对话中，把握和理解人类哲学理念和自我认识的思维进路。但文本本身

毕竟是适合于特定的时代 针对特定的问题情境 其理论的发展水平及其内涵的有效性将呈现出时空特质性，因而单纯的文本阐释的意义是有限度的。同时，这种研究主要是主观价值判断，没有把交往作为客观历史实践进程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交往问题研究需要开拓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研究的新境界、新视野，需要深入系统地分析交往是怎样一种历史实践过程，揭示现实的交往实践形态和形式。我们应对当代人类社会交往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做出新的概括，从中找到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和参与信息化与全球化交往实践进程的切入点，而不能总停留在价值理论的分析判断上。

要突破文本阐释的意义，基本的途径在于实现由侧重文本的研究向侧重以社会交往行为、社会交往方式为对象的实体研究的转向。也就是立足于历史场景和现实情境对社会交往的发生和发展、社会交往的结构、社会交往的运行机理和演变机制、当下社会交往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合理社会交往模式的建构等问题进行理论上的考察。这种转向 在基本的研究思路 就是在哲学的形而上层面和具体的实证层面之间实现一种结合，力图对人们的具体的交往实践行为发挥某种理论上的导向作用。

从哲学历史观角度看，信息时代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就是 由于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络等现代信息科学技术手段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人类的社会交往手段和方式已经实现了信息化，信息化交往活动方式已日渐成为信息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交往活动方式——这已成为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

由于人类交往实现了信息化，使得现实的交往主体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强大的交往手段，这不仅使交往主体的本质力量得到极大的增强 同时 由于交往的信息化的实现 交往的

客体域也相应地得到了多维度的拓展与延伸，并且由于交往中介手段的根本变化，交往的主客体相关联的时一空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必然会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等等。

显然，这一切在哲学历史观上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深入揭示信息化的交往活动的手段、交往活动的方式的本质和特征，以及信息化交往革命的重大社会意义，这是信息时代给哲学历史观提出的新课题，也是当代哲学历史观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实践性和开放性为本质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该做出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理论回应，从而真正成为信息社会的时代精神之精华。

早在 19 世纪后半叶恩格斯就讲过一句至理名言：“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①这一论断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说无疑也是适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应当随着信息科学技术这一划时代的发现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创立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信息化社会交往理论。本课题就是以此为宗旨，为适应信息时代现实的社会交往实践所提出的这种客观要求，从交往手段变革的视角，对社会交往方式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当代信息化交往手段革命所引发的交往方式变迁，以及当代交往革命所产生的重大社会文化后果进行一种较为系统的社会哲学研究，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的视野，更好地指导我国面向信息时代的交往实践，推动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

对于交往手段革命与交往方式变革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交往革命的重大社会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做过比较深刻的探

讨。现代西方学者也曾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看法，但除哈贝马斯较为详细地分析了科学技术对社会交往的作用和影响以外，其他学者只是提出了一些观点，并未进行具体分析和展开，更无人从逻辑、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系统阐释和分析交往手段革命对社会交往方式的影响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后果。对这一问题以及这一问题在信息时代的存在状况，我国学者目前还没有人进行比较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三、本书研究社会交往问题的基本理路、方法和意义

1. 本书研究的基本理路

本书认为，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交往手段革命，对于社会交往方式的变迁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技术关涉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按照艾吕尔的看法，“现代技术已经构成人类生存的整体环境背景 因此 无论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或思想的研究 都必然会涉及技术，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①。技术作为人的生存环境，如同人生存的自然环境一样，在本质上已经成为人自身。

现代科学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时代的社会面貌。自从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与社会在互动中共同发展，进入 20 世纪后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计算机技术引起的信息革命波及全球，“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目共睹和无可否认的，但对人们社会交往的影响却是非常复杂，而且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在我国社会现实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对

转引自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4 页。

人们的社会交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人们社会交往的手段越来越先进，科学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2) 人们的社会交往意识由封闭向开放转化；(3) 人们社会交往的空间和范围越来越大；(4)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变得越来越隔膜、孤独等等。

以上现象应引起我们理论工作者的重视，提醒我们要关注科学技术对人们社会交往的影响，在发展科学技术时不能忽视它对人们社会交往行为产生的后果。

任何社会交往都是通过一定的交往手段和交往工具而进行的，而交往手段和交往工具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有着直接的关系。科技革命在社会交往领域中首先突出表现为社会交往手段的革命。科学技术就是通过对社会交往手段的革命变革而决定和影响社会交往方式的发展变化的。因此，探讨科技革命与人类社会交往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就是对交往手段革命与交往方式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揭示和说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曾对交往手段革命的巨大社会作用给予过比较详尽的分析，对于交往手段革命对社会交往方式变革的影响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后果做过经典性的说明。这些问题也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三次大的交往手段革命。第一次，发生在农业社会，主要标志是文字和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第二次，发生在工业社会，主要标志是以铁路和电报、电话的发明和应用为核心内容的交通和通信革命；第三次，发生在当代已经或正在形成中的信息社会，主要标志是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集中在通信领域。第三次交往手段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交往革命。

与交往手段革命相应，人类的社会交往方式也发生了历史

性的巨大变迁。为了把问题集中 并便于考察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交往方式的变化：一是交往空间和范围的变化 二是交往关系的变革。前者着眼于外延的考察，后者着眼于内涵的分析。从社会交往范围看，第一次交往手段革命尽管拓宽了人们社会交往的空间范围 但从根本上说 农业社会的人们一直局限于狭隘的地域性交往；第二次交往手段革命完成了从地域交往向世界交往的转变 第三次交往手段革命则实现了交往的全球化、多元化和便捷化。从社会交往关系来看，第一次交往手段革命发生于人的依赖的交往关系社会中；第二次交往手段革命使社会交往关系实现了从人的依赖向物的依赖的转变；第三次交往手段革命则使社会交往关系从物的依赖转变为信息或知识的依赖的交往关系。

交往方式的变革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指标，而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直接制约因素。社会交往方式不同，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面貌也就不同，社会交往方式的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交往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后果，并对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分析不同时代社会交往方式的不同的社会文化后果及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不同意义 对于确立合理、进步的社会交往方式有着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科学技术作用巨大 它不但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而且影响着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过去，人们只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中的作用，而对科学技术在社会交往这种非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却未能给予充分的注意和研究。本书认为，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科学技术的作用 二是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审视社会交往的全貌 揭示其新

的特点；三是有助于强化社会交往理论的科技意识，增加社会交往的科技含量，使社会交往理论能更有效地指导人们的社会交往实践。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本书在对社会交往的研究中，企图以“交往手段革命”为切入点，以“社会交往是人的存在方式”为理论原点，以“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在技术社会形态发展的宏大背景下，着重讨论交往手段进步与交往方式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社会交往的什么地方存在交往科技，交往科技如何才能转化为交往能力，并进而决定社会交往方式的变迁以及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2. 本书的研究方法

我们的目的是客观地分析说明不同历史时期的交往手段对社会交往方式的影响和作用，唯物辩证地考察和分析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和发展而必然导致的人类交往手段与交往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社会交往革命的社会文化后果试图做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回应。

因此，本书的研究视角既不可能是纯社会学的，也不可能是纯哲学的，而是一种社会哲学的视角。之所以说是一种社会哲学意义上的研究，是因为一方面作为一种总体上的把握，它不能不从一些基本概念和关于人类本性的基本假定出发，而这些概念和这些假定是无法诉诸经验之验证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对现实社会事物的研究，它又不能离开现实实践经验去进行纯粹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推论。本课题研究是一种理论思辨与现实经验的结合，即一方面力求从基本概念和关于人类本性的一些基本假定出发去合乎逻辑地说明现实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则力求将特殊的现实经验提升到适用于任何社会转型的普遍性水平。而这正是一种社会哲学的视角。

本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观点和方法，利用传播学、科技哲学、人学、社会学、社会哲学的原理和成果，对社会交往手段革命、社会交往方式变革、人类社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历史演进过程，进行了全面而又具体的分析。本课题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理论思辨与现实经验相结合的方法，哲学与社会学、传播学、人学相结合方法 等等。

本书也试图学着迈克尔·德图佐斯写作《未来的社会——信息新世界展望》一书的方法去写，即“以技术和人文两方面都能理解的方式撰写”。以便技术派和人文派这两个人为的彼此隔绝的极端都能够“欣喜地发现”，自己“遗忘的那一半竟那么生气勃勃、绝妙无比，而且急需加以促进”^①。当然，本书也无意持一种折中的观点。事实上，社会发展就是辩证的和历史的，无论是决定和影响社会变迁的基本因素，还是诸因素最后产生的社会后果，都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社会发展是历史必然性和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对于历史的发展，人类不是无能为力，也不是无所不能，人类所能做和所应做的是怎样使人类社会以更符合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的目的尽可能快地向前发展。

3. 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通过本书的研究，若能较为正确地揭示出交往手段、交往方式与人类社会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社会交往方式的发展机制和历史演进过程及交往革命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做出较为合理的阐释，并能对社会交往手段的信息化，对社会交往方式带来的巨大变革及其所产生的重大社会文化后果做出一定的富有启发性的理论分析，这对于人们从哲学高度把握社会交往方式演进

迈 克 尔 · 德 图 佐 斯：《未来的社会——信息新世界展望》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 版 第 29 页。

的一般规律及其生存论意义和社会价值，进一步理解信息社会的时代精神与计算机和互联网络等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丰富、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对于澄清人们在网络交往及其社会影响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 均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交往方式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对社会形态的“人类测度法”，通过对它的历史考察，可以对各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形成更为具体的认识。对于各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区别的认识，从根本上来说，是从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体结构上去阐明的，但进而从社会交往方式的对比上去说明，就更为具体了。一定的社会交往方式，是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本书立足于技术社会形态的发展，从交往手段变革的视角对社会交往方式的变迁及其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后果进行历史考察，不仅可以凸显交往手段革命的力量，彰显交往手段革命在社会进步及人自身发展中的特殊价值和意义，而且通过这一研究，还可以实现与从经济社会形态角度对社会交往方式进行研究的互补，能够更进一步说明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曾经把新哲学的对象规定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解答实践活动中的现实问题，从而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提供方法论指导。本书的研究，正是遵循着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理路和立场，试图为解决当代信息社会中的社会交往问题，提供一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发 以便有助于人们主动、积极、自觉、合理地开展社会交往活动，充分发挥社会交往的积极功能，不断改善社会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这一点来讲，本书研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四、本书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书研究的直接目标是立足于从前现代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再到当代信息社会的巨大社会转型，从社会交往手段历史变革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交往方式所发生的历史变迁及其一般规律，并通过对当代信息化社会交往的特征及其社会文化后果的着重分析，进一步明确合理社会交往的标准及其实现途径，为人们的社会交往实践，尤其是中国面向信息时代的社会交往方式的现代化指明正确的方向。

本书的研究是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或思路进行的。其基本内容共有五章，分为三大部分，具体叙述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主要是基础理论研究。侧重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交往概念的哲学内涵及其在人和人类社会中的功能和地位，并着重分析了社会交往方式的结构和特征以及社会交往方式演进的一般规律。我们认为，社会交往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社会交往方式由交往能力和交往关系构成，是交往观念、交往手段、交往范围、交往关系等各要素的复杂统一体。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影响和制约社会交往方式的基本因素，交往手段是交往能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交往方式变革的直接决定力量。交往手段通过从外延上对社会交往空间范围的拓展和内涵上对社会交往关系的变革深刻影响着社会交往方式的性质和面貌。通过这些分析，为描述交往手段进步所导致的社会交往方式变迁建立了一个一般性理论前提或“坐标系”。在这个基本前提下，以后各章进入对交往手段革命与社会交往方式变迁及其社会文化后果的具体分析。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四章，主要从人类社会交往手段发展变革的视角，具体探讨了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社会交往方式演进的不同历史形态和一般特征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后果。其中，第二章主要对前现代社会（或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社会交往手段、社会交往方式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后果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分析。通过历史分析，一方面进一步说明和证实交往手段、交往方式和社会发展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原理；另一方面形成与当今信息时代社会交往发展特征和趋势的比较，以作为研究信息时代社会交往发展的参照。我们认为，在前现代社会，基于落后的交往手段之上的社会交往方式以人的依赖关系为主要特征，存在于“自然共同体”内部的人的社会交往是封闭的、地域性的；以交通和通信为主要标志的现代交往手段革命，促成了物的依赖的交往关系的产生，“利益共同体”的存在使人类实现了从地域交往向世界交往的自觉转变。现代交往手段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解放。第三章侧重分析了信息时代社会交往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在当代，随着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络的发展，社会交往手段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一场革命。当代社会交往手段的信息化和网络化，使人类社会交往表现出全球性、虚拟性、多元性和便捷性等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点，以知识和信息为纽带的“信息共同体”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社会交往关系的又一次质变。第四章，着重分析了信息化社会交往革命的社会文化后果。我们认为，一方面，信息化社会交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推动了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局面，并促进了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诞生和人的全面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信息化社会交往又引发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矛盾，并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交往主体异化。全面分析信息化社会交往革命的社会文

化后果，为进一步考察和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交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现实依据。

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侧重探讨了面向信息时代的中国社会交往方式的现代化问题。我们认为，目前中国面临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挑战，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与现代的、合理的社会交往模式相比，仍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采取各种对策和措施，建构合理的社会交往模式，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本章分析，进一步映现本课题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本书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与以往从经济社会形态角度对社会交往方式进行考察不同，本书立足于技术社会形态的发展，从交往手段变革这一新的视角，对社会交往方式的发展机制和历史特征以及交往革命的重大社会意义进行了逻辑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全面考察和分析，实现了与从经济社会形态角度对社会交往方式研究的互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第二，系统论证了交往手段、交往方式、交往能力、交往关系、交往合理性诸范畴，辩证分析了社会交往与社会生产、交往能力与生产力、交往关系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等诸对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交往能力与交往关系矛盾运动过程的历史考察，揭示了人类社会交往方式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

第三，在人类社会交往方式演进规律的理论关照下，探讨了中国面向信息时代的社会交往方式现代化的目标模式和路径，构建了一种合理化的理想社会交往模式。

第一章 社会交往与社会交往方式

自从有了人和人类社会，就有了人的社会交往行为。交往维持人们的生存，并推动人的发展。交往也是社会生成和进步的不竭的动力和源泉。社会交往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社会交往方式是交往能力和交往关系的有机统一体。社会交往方式不是永恒不变的，交往手段是制约和影响交往方式变迁的直接决定力量。交往手段革命通过变革交往主体的社会交往观念、社会交往的空间和范围以及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使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交往方式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内容。社会交往方式状况影响并制约着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一、社会交往的本质^①

要想说明人类社会交往发展变化的规律及当代社会交往发展的趋势和特征，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交往。社会交往的特征和类型以及社会交往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社会交往的本质问题是解决其他一切社会交往问题的理论前提和现实基础。那么，哲学上所讲的社会交往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与其他具体社会科学关于社会交往问题的研究有什么区别？它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些问题是我们首先

本节部分内容以《社会历史哲学视野中的交往问题》为题发表在《河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5期。

必须搞清楚的根本性的问题。

1. 社会交往的含义及特征

社会交往是个非常复杂和多层次的社会现象，不同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交往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和说明。社会交往同样也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交往活动与生产活动具有同构性，具有实践的一般规定性，但又具有其自身的一系列基本特点。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交往也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对社会交往做出不同的分类。

(1) 社会交往概念的哲学规定

社会交往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人和人类社会只要存在，就必然进行着一定的社会交往活动。正因此，社会交往概念和社会交往理论也就如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但是，对社会交往概念作哲学上的反思却是晚近的事情。事实上，只是在近代伴随工业革命人类交往方式发生巨大变革，世界开始进入全球化和普遍交往时代时，才使得社会交往问题的研究成为一种迫切的理论需要，并具备了建立一种社会理论体系的客观基础，社会交往才作为一个社会性问题而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社会交往概念也进而逐步演变为一个哲学概念。

其实，在哲学史上，早就有许多哲学家对交往问题进行思考。例如，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在实践哲学中就把公正交往看成是对待他人的德性，是人在实践智慧中的最高德性。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批判自然法和因果理性时，强调情感是人性的基础，与他人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应该与人性相适应。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也提出，自由理性是人们之间普遍联系的本质，社会、法和国家是个人冲突的结果，各民族的冲突在竞争的平衡中走向世界历史和世界公民体制，整个过程是摆